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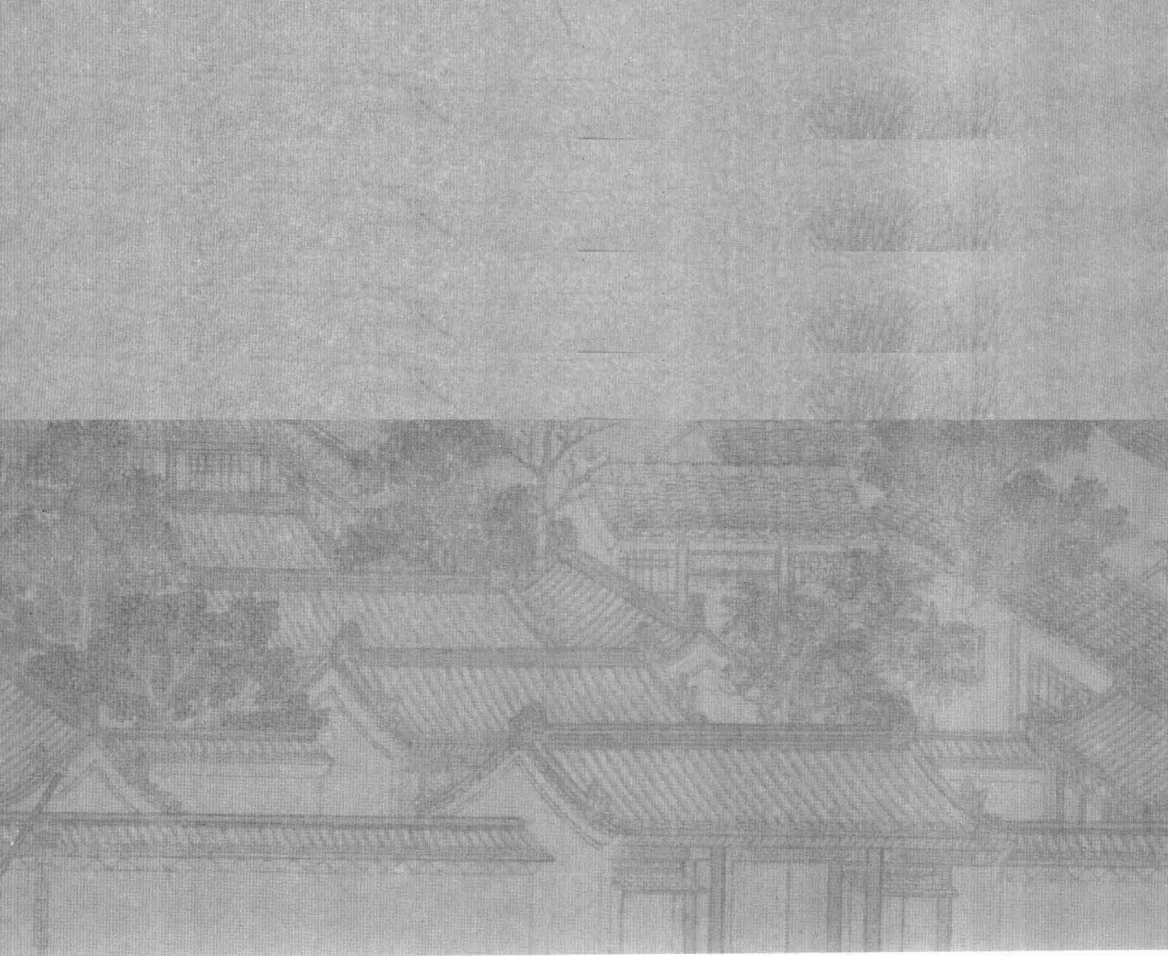
清史研究丛书

北京与江户

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

刘风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与江户

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

刘凤云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与江户：17～18 世纪的城市空间/刘凤云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4

(清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0-15561-6

I. ①北… II. ①刘… III. ①城市史：建筑史—北京市—17～18 世纪 IV. ①TU-098. 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77681 号

中国人民大学“985 工程”资助

清史研究丛书

北京与江户

——17—18 世纪的城市空间

刘凤云 著

Beijing yu Jianghu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张	23.5 插页 4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2 000	定 价	4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顾问

戴 逸 李文海

主编

黄兴涛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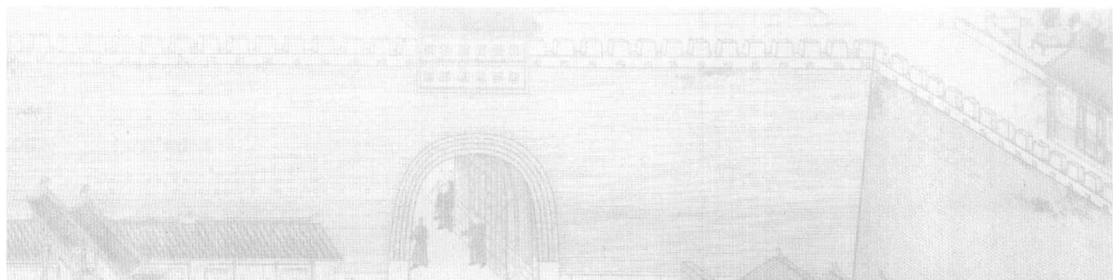
成崇德 华林甫 刘风云 祁美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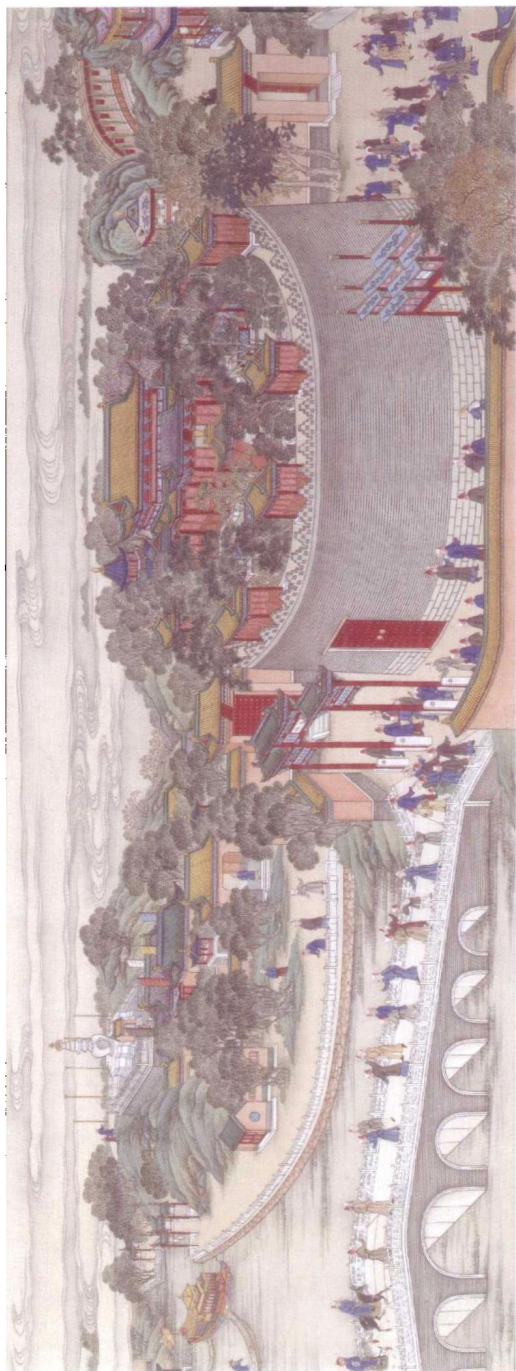
杨念群 何 瑜 陈 桦 张世明

张永江 孟 超 夏明方 黄爱平

秘书

谭徐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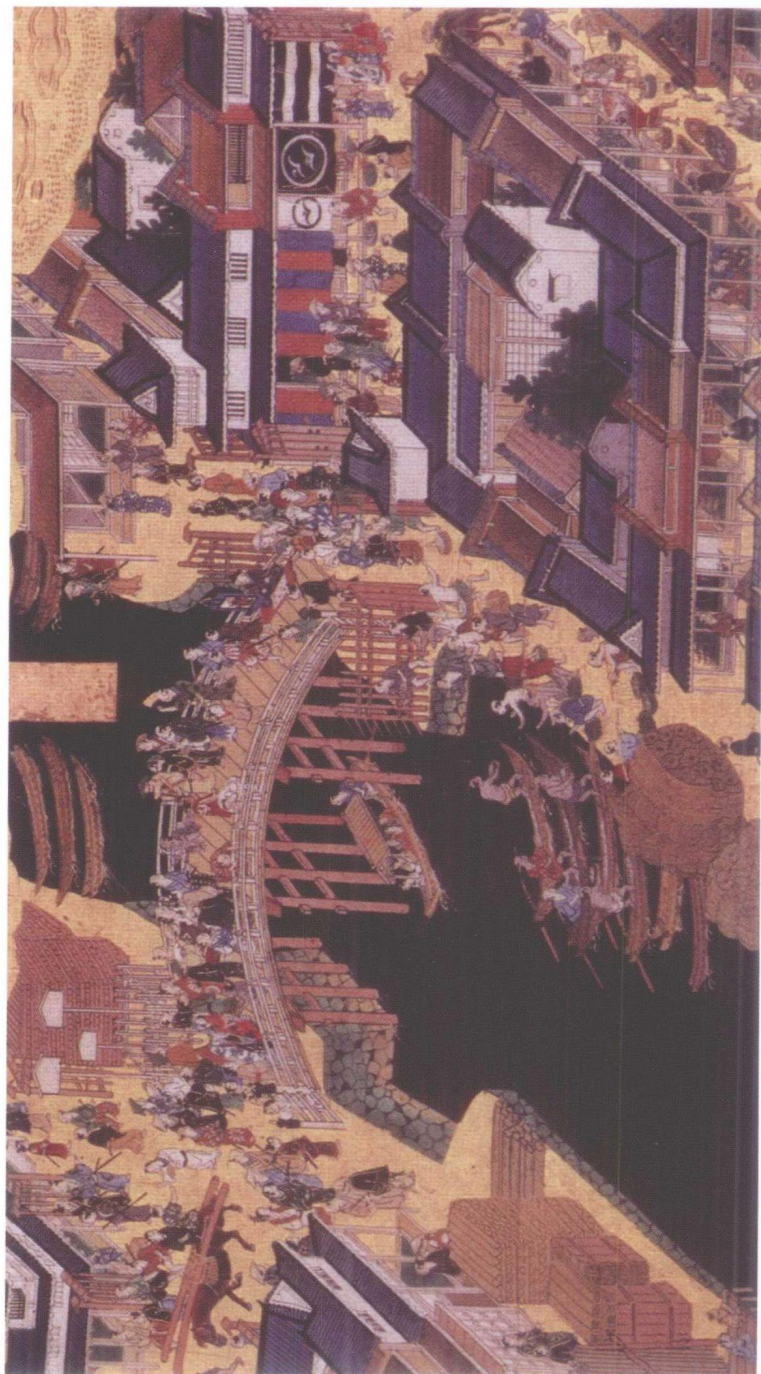
北京的城墙（一）



北京的城墙（二）



大坂城天守閣



江戸日本橋

“清史研究丛书”重启说明

“清史研究丛书”原由戴逸先生发起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从1988年开始至2001年，它曾推出《清前期天地会研究》、《戊戌思潮纵横论》、《四库全书纂修研究》、《清代八卦教》、《明清农村商品经济》、《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晚清乡土意识》、《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乾隆帝及其时代》、《洪亮吉评传》、《康雍乾三帝统治思想研究》、《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与《晚清讼狱制度的社会考察》等13部力作，在清史学界产生过重要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该丛书的出版一度中断。现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协商，决定从今年起将其恢复起来。

清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在其统治的近三百年时间里，中国不仅经历了由强盛到衰弱的转折，也经历了社会性质从传统到近代的深刻变革，这就决定了这段不寻常的历史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同今天国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必然发生着多方面的密切关联。人们常说，“中国今日之疆域版图和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人口基数即奠定于清朝，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民族问题，许多也都由清朝演化、延伸而来”，这的确是对清史研究之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极好概括。我们之所以致力于推动这套丛书继续编辑出版，其宗旨和动力来源也正在于此。

“清史研究丛书”是发表高水平清史论著和重要清史文献的专业学术平台。它强调学术的前沿性和国际性，提倡严谨、扎实的学风，崇尚史学的综合功夫，鼓励跨学科视野和方法创新。就研究内容而言，它则坚持清代前后期历史的一贯性和统一性，反对将其前后人为加以割裂的

做法。

本丛书仍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负责组稿和审稿。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正式成立于1978年，其前身为1972年组建的清史研究小组。三十多年来，清史所的成员们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均做出了积极努力，并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宝贵支持、帮助和认可。2000年12月，它被教育部批准为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乃清史研究基地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期盼本丛书的出版，能够继续得到广大清史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

“清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2010年7月

“清史研究丛书”总序

“清史研究丛书”问世了，这是值得庆贺高兴的一件事。这套丛书以推动清史的研究和写作为主旨，希望能为我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发展尽一点力量。

清史是个辽阔宽广的研究领域，上起 16 世纪末满族的崛起，下至本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帝逊位。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问题繁多。离我们今天的时间较近，与现实息息相关，研究这段历史十分重要，这三百年，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转折。清代前期和中期，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经历了康雍乾盛世，我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封建专制体制日益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版图辽阔巩固，文化事业兴旺，达到了封建王朝所能攀登的高峰。但是，如果拿中国封建末期的成就同正在经历产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欧历史作比较，则相形见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发展的先进潮流并且正在拉开越来越大的差距。到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终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赔款割地，国势凌替，危机四伏，民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由此而爆发了反帝反封建革命，许多革命志士前赴后继，斗争绵延不绝，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帝制。人民冲破了黑暗，历史微露出晨曦，迎来了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世纪的清代历史经过了由盛转衰、由衰而复的漫长曲折过程。这一过程至今还没有终结，中国已经从沉睡的酣梦中苏醒，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正在大踏步前进。祖国的建设、民族的复兴、“四化”的重任落在我们及以下几代人的肩上，必须团结一致，努力不懈，长期奋斗，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

发出青春。

历史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当人们为了改造现实而迈步前进的时候，经常会回顾全民族刚刚走过的路程，从中汲取力量，获致教益。人类有回忆往事的爱好，有总结过去的习性，有从自身成功或失败中学习的潜力，有寻根的愿望，这是推动人们进步的力量。谁忘记了过去，谁就容易重犯过去的错误；而谁更多地理解过去，谁就有了更好的准备去迎接和建设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史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清史研究的领域十分宽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外交、思想文化等许多方面。为了掌握中国的国情，全面、正确地了解中国的过去，我们必须在漫长广阔的历史领域中艰苦探索，观其大局，提其纲领，揭其规律；又要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上踏实钻研，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索隐探微，释疑抉奥，作认真细致的整理和剖析工作，即把综合和分析结合起来，把宏观的研究和微观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再现清代三百年历史的真实面貌。

清史资料浩如烟海。档案、官书、文集、方志、野史、笔记、传记、谱牒、契据、报刊，种类繁多，数量浩瀚。汉文以外还有大量少数民族的文字记载和外文资料。任何才人智士，穷毕生之力也只能在浩浩茫茫的清史资料的汪洋大海中窥其一角，要凭借这样繁多而杂乱的历史资料来展现漫长的清代历史画卷，这既给研究者充分发挥才智、大显身手提供了用武之地，也要求全体研究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分工合作，潜心沉思，锲而不舍，把毕生精力奉献于钻研和阐扬祖国历史的壮丽事业。

尽管近年来清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著作和论文的数量、质量有了明显的增长、提高。但它相对于其他断代史而言，起步较晚，清史领域仍然有很多空白、薄弱的部分急需填补和加强，研究工作者只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必能得到丰厚的收获。“清史研究丛书”将为一切研究工作者提供发表成果的园地。我期待着：在若干年以后，这片园地将是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成为绚丽多彩的盛大花园。

戴 逸

1988年1月

自序

在历史上，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历史一直是与人类的进步和文明联系在一起的，而文明即是社会与文化的总和。古今中外城市发展的历史证明，凡是城市繁荣的时代，必然是社会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的时代。从另一角度来看，城市文明的形态，或者说城市的性质又是与政治体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文明形态在上层建筑最集中的反映是政治权力的构成。这一点，尤其适合于中国城市。

在世界城市发展史上，中国城市从古代起就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在以往的研究中，在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影响下，学者们通常认为，古代中国的城市是作为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建立起来，并在其影响下形成了以政治关系为主体特征的经济结构，即服务于政治的消费型城市。城市经济结构的长期稳定性，在社会转型中表现着某种“滞后力”，近代城市从其萌芽状态到完全意义上的兴起，都未能构建起独立于自然经济之外的商品经济结构。在政治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制约下，城市反而成为有助于传统经济关系得以延续的要素之一，如此等等。而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则对中国历史上的城市有着更多的非议。马克斯·韦伯以欧洲城市为理想类型，指出城市的形成建立在经济活动之上，是以市场交换为主形成的一个社会互动体系，“是财政理想化、货币经济，以及以国家政治为取向的资本主义的承担者”，是现代西方特有的产物，是理性精神、自由平等的理念及民主制度的体现。“在（中国）这类城市里，正如西方古代的城市或奴隶制时代的莫斯科一样，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年金，一部分是地租，一部分是官僚及其他直接或间接借政治力量而收得的收入。……中国的城市既非古希腊等地的城邦国家，也没有中世纪那样的都市法。”作为城市的属性，“城市共同体”和“市民社会”

这两个概念所对应的实际事物在中国古代并没有出现，其原因来自政治体制的特性与中国的特殊社会经济结构，诸如“皇室统辖力的微弱，造成了居住在城乡的中国人实际上自我管理的局面”，“中国城市的兴盛，主要并不是靠城市居民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冒险精神，而是有赖于皇室统辖的功能”^①。

上述论点及其结论大都是基于与西方城市的比较而言，而马克斯·韦伯的言论尤具影响力，这正如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说：“城市造就了欧洲这块狭小大陆的伟大，因为经过马克斯·韦伯的倡导后，欧洲一直在通过与其他大陆的关系说明它自身。”^② 因此，西方城市及其相关认识在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参考系数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思考和质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城市研究的兴起，国内学术界开始就中国城市的起源、功能、结构、作用，以及精神与特质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参与并回应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的论点，其中以明清江南市镇和近代城市史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而韦伯以欧洲城市为普世模式解释中国城市的观点也遭到了更多的批判，在致力于破除西方中心观，“从中国发现历史”的学术环境下，出现了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通过两部研究汉口城市的专著与韦伯对话的学术讨论，并激发起中国学界对中国“市民社会”等城市问题的研究热情。只是，罗威廉借用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模式来证明独立于国家的“公共领域”在中国近代的浮现，仍存在西方理论的背景状态，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从中国发现历史”。而韦伯从欧洲中心观出发的中国城市研究，虽然有着实证研究的缺陷，但是他对中国城市解读的一些观点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诸如，他强调中国城市是皇家权力在地方的代理，城市是诸侯的官邸所在地，是中央权力在地方的代表，一些城市并不是随市场交换的发展而产生，等等，都可作为进一步论证的问题。而他的

① [德] 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第1章，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② [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译，施康强校：《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60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

社会学思考方法更是值得我们加以借鉴。

但是，接下来的问题还是回到如何做到“从中国发现历史”的老问题上，这或许是摆在每个史学研究者面前的课题。我以为，理论框架、研究范式等都需要以切合历史本身为原则，而不是将历史强行塞入某一框架或某一范式，历史学虽不能称之为“科学”，但是它的实证要求却是相当的严谨。因此，理论与实证的统一，才应该是史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这也是本书为之努力的方向。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取向

本书不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也不欲就城市的总体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比较。所以想写这本书，是源于十五年前在日本东海大学做研究时所思考的一些问题。由于出国前，我刚好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项目“明清城市文化研究”，于是，我在日本的研究课题也就自然选在中日城市的比较方面。但是，当我在接触了与明清同时、确切地说是与清朝同时的日本江户时代的城市历史之后，一个很直接的问题赫然摆在了我的面前，这就是我发现了两国的历史及文化的差异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以往由教科书中所获取的知识界域，认识到两国在近代发展道路上所出现的差距绝不仅仅是日本选择了明治维新。于是，我的思考随着疑问展开，那就是，曾经属于中国大文化圈至今还在使用汉字的日本，在文化上从何时开始脱离东方文明的轨道，何时又与中国发生了政治性质的裂变？我开始借助城市研究的领域梳理相关资料。可以说，我对北京与江户的比较研究是从日本与中国文化的变异性开始的。而这种变异或者差异在哪里，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便成为本书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也是研究的切入点。

从历史的发展看，古代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中心，而仿照中国建国的日本，接受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文化思想，其最初的城市形态，即京都、奈良等城的建置也是中国长安城的模拟。但是，至19世纪中叶，日本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中国也被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强行打开了封闭的大门，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那么，在此之前中日两国

各自发生的改变，当是解开问题的关键。而这又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包罗甚广的问题。由于都城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传统社会，它不但全面体现了传统政治的属性及特征，而且是整个传统社会的缩影，特别是对从属于政治的东方型城市而言，社会变革与转型都是最先从都城开始的。所以，这一时期的都城尤其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问题，对其研究本身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这一段的历史，从时间断限上，自1603年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开府江户始，至1868年明治维新止，这265年的历史为日本的江户时代，与自1644年清兵入主中原，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267年的清代中国历史，在时间上比较相近。但在本书中，主要就17—18世纪社会转型前发生的某些问题进行讨论。

在日本访学期间，我的指导老师曾根总雄教授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帮我收集到了当时可能找到的几乎所有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并就我的研究方向不断地提出意见。由此，我开始在书中接触到日本城市史研究的一些前辈和他们的成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的城市史研究起步未久，成果还大都在创造过程中，而日本已是硕果颇丰了。就其研究的方向看，涉及近代之前的主要问题有江户城下町发展及形态、社会结构、身份制对江户的影响、町人的发展与町人文化、武士与町人的关系等等，且其细致深入的研究风格也在城市研究中多有体现。这里仅就对我启发较大的研究枚举如下。

丰田武著有《堺—商人の进出と都市の自由》、《封建都市》等，他讨论了日本中世后期（约15—16世纪）“城市自治”、“自由城市”、“市民社会”等问题。提出作为沿海港口发展起来的城市“堺”是日本战国诸侯的对立物，是以町人为基础的城市国家等观点。并认为16世纪以后，“堺”向封建都市转变。原田伴彦有《都市发展史研究》、《都市社会史研究》、《都市形态史研究》等系列研究，明确提出在日本历史上有三种类型的城市，古代都市是贵族官僚专制统治下的消费市场，封建都市是在织田信长时形成的（城下町是它的典型形态），近代都市是具有产业特征的都市。他说，城下町从字面理解是城砦城市，具有防御性质是其重要特征。同时他也认同16世纪的“堺”是日本历史上类似欧洲的自由

都市，但他强调“近世”封建都市形成与中世都市的关联性。西山松之助主编了六卷本《江戸町人の研究》，该书集结了日本学界对江戸町人的众多成果，西山松之助以总论的形式讨论了18世纪的江戸町人，余者多就町人的各个类型进行了讨论，其中土肥鉴高的《享保期の江戸町人——米商の动向为中心》、北原进的《宝历一天明期の江戸商业と札差》尤其启发了我去思考中日商人的异同以及经济领域的流通方式对国家经济的影响等问题。松本四郎的《日本近世都市论》是从与欧洲城市的比较开始的，他对自由都市、自治共同体等概念进行了讨论，同时他认为研究日本“近世”封建都市必须要结合农村问题，在书中他重点讨论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城市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城下町的各种居民及其性质等。吉田伸之的《近世巨大都市の社会构造》是一部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江戸的著作，集中讨论了江戸的社会结构、社会纷争以及社会权力等问题。朝尾直弘的《日本の近世：身分と格式》也是基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对身份制在城市社会结构中的作用等进行了深入剖析。以上日本学者的研究，无疑是我获取相关知识的重要来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我自己的观点。

研究中，我首先注意到的是日本的城市体系问题。即江戸时代的城市体系是建立在幕府封建政治体制下的，是由幕府将军分封大名，在诸大名领地上按照武士风格（天守阁）建立起来的。而且，我对日本町人在江戸城市中的管理者的地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日本具有商人身份的上层町人，他们可以是城市末端的管理者并享有诸多的权力。而且，在町人群体中，我除了对这些上层町人的政治权力感到与中国有差异外，还发现町人中从事金融兑换行业的“札差”掌握了江戸乃至国家经济的命脉。此类垄断城市金融的商人在清代虽然不曾存在，但是，在18、19世纪之际的北京也出现了钱铺票号商人以及米商等通过对旗人糯米买卖的介入致使部分旗人贫困化的事例。因此，在札差和清代的钱铺票号那里我找到了商人利用货币的杠杆作用操控城市经济的共性特征。

于是，我从自己以往对中国历史认知的储存中找到几个与日本反差最大的问题开始了自己的比较研究，回国后相继发表了三篇研究论文，即《江戸时代的町人与明清商人之比较——兼论中日都市文化的差异》、